

評介翟新《東亞同文會與中國：近代日本的對外理念及其實踐》

林志宏*

《東亞同文會と中國：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對外理念とその實踐》。
翟新著。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01年1月。348頁。

中日關係史的研究，長期以來是學界焦點之一。特別關於鴉片戰後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課題，美國與日本學界始終抱著極強烈的研究興趣。¹在中文著作方面，臺港地區除了零星的論文以外，能夠形成有系統的專書，大致只有1970年代以降黃福慶、譚汝謙等先生初步的成果而已。²整體來說，這個領域的空間仍有許多亟待開展之處。

在中國大陸學界方面，隨著1980年代「改革開放」的腳步，猶如美國加州大學Joshua A. Fogel教授討論崔述如何「進入」學術史一樣，他們也「重新發現」(rediscovery)了近代中日關係這段歷史的重要性。³不僅在北京、杭州陸續成立了日本文化研究所，整理或出版相關史料及著作，⁴值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¹ 這方面的研究著作很多，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參考下列兩本工具書：山根幸夫編，《增補近代日本關係史研究入門》（東京：研文出版，1996）；Christopher Howe ed., *China and Japan: History, Trend, and Prospect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² 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黃福慶，《近代日本在華文化及社會事業之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譚汝謙，《近代中日文化關係研究》（香港：香港日本研究所，1988）。黃福慶的《清末留日學生》一書，曾被翻譯成日文、英文等形式；而譚則曾與林啟彥合譯日本學者實藤惠秀著《中國人留學日本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2）。

³ Joshua A. Fogel, *The Cultural Dimension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Essays o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Armonk, N.Y.: M.E. Sharpe, 1995), pp.3-21.

⁴ 史料的編纂如：嚴修著，武安隆、劉玉敏校注，《嚴修東游日記》（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近年來，王寶平、呂順長等以浙江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為班底，開始編纂《晚清中國人日本考察記集成》系列叢書，目前已經出版的有收集晚清多種文獻匯為一編的《教育考察記》

得一提的是，90 年先後前往日本留學並取得博士學位的學者，如汪婉、熊達雲等人，最近幾年來也紛紛出版日文專著，⁵他們對於近代中日文化史的研究成果，備受關注。

本書作者翟新（以下簡稱作者）也是這群類似背景學人隊伍裡的一員。作者係武漢大學歷史學士與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碩士，受過傳統的史學訓練；1998 年在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法學研究科獲得博士學位，研究的專業領域為東亞國際關係史。早自碩士修業期間，作者便會翻譯日人關於中日近代化的研究著作，⁶對於以中華帝國為主體的東亞世界秩序有著濃厚的興趣。這部《東亞同文會と中國：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對外理念とその實踐》（《東亞同文會與中國：近代日本的對外理念及其實踐》，以下簡稱本書），即是以東亞同文會為主軸，分析 1890 年代至 1930 年代中日政治與外交關係的專書，係依據作者的博士論文修改而成，也是他個人長期關懷下所衍生的作品。

有關東亞同文會的研究，無論在資料的編纂與二手討論著作方面，事實上已經是汗牛充棟。然而作者認為，在現有的研究基礎上，還是存在著可以進一步探討的空間：第一、他認為目前學界尚未有以東亞同文會的對外活動及認識做為範疇來探討的成果。也就是說，以具有組織性的團體的研究尚鮮，而研究的結果也多半只是停留在針對幾位著名的個別成員，如荒尾精、近衛篤磨及根津一等人的中國觀進行分析而已，並未觸及本書所要處理的問題核心；第二、有關東亞同文會的角色，作者指稱，過去並沒有將它置於東亞國際政治舞臺上來考量，並釐清其思想背景，特別係就其對華的認識和展開作用加以檢討，他認為這正是值得努力的方向；最後，作者提到要掌握東亞同文會研究，資料的收集和克服語言障礙等問題，仍舊是處理此一課題時最關鍵的因素（頁 16-7）。

本書包括前言與結論，共分為十章。在篇幅僅三百多頁的書裡，其中

（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上、下兩冊，及黃遵憲《日本國志》（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2001）。著作方面則有王曉秋，《近代中日關係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北京：中華書局，2000）、呂順長，《清末浙江與日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等。

⁵ 汪婉，《清末中國對日教育觀察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8）；熊達雲，《近代中國官民日本の視察》（東京：成文堂，1998）。

⁶ 依田喜家著，孫志民、翟新編譯，《中日近代化比較研究》（上海：三聯書店，1988）。

有絕大部分的章節已先行在各刊物或論文集內發表（見頁 313-4）。書末另附有「事項」和「人名」的索引，以及東亞同文會與中國關係年表和《同文滬報》論說一覽表。

本書處理問題的方式，就時間斷限而言，大致可區分為 19 世紀末、20 世紀最初十年以及辛亥革命以後三階段。這是作者獨具慧眼來看待日本對華政策階段性的看法，也是本書重點所在。眾所週知，東亞同文會是在 19 世紀末葉中國面臨西方列強瓜分危機，以及在「戊戌變法」失敗之後，由日人所組成的國際團體。它最初的構想是日人基於重視中國能夠提供工業原料和市場，因而提出中日合作的主張，以「同文同種」作為口號，企圖「保全支那」、促成中國改革為目標。第二、三章企圖說明該會在 19 世紀末觀點的形成及活動。第二章「對外理念及其實踐的原型」，即從荒尾精的中國觀出發，探討甲午戰爭前後，如何以軍人角色的立場提出「商權競爭」的看法；透過設立日清貿易研究所，扶植親日勢力，並反對日本戰後對華進行領土割讓與鉅額賠款，目的在防止中國人對日情感的惡化。後來，這些主張進而影響到荒尾精的親友及門生，並促使他們組成東亞同文會，繼承了此一理念。第三章「19 世紀末葉中國改革運動的對應」，著重在東亞同文會對清季「戊戌變法」的態度及肆應。作者指出，儘管原先東亞同文會的理念係協助中國的改革，尤其是應該支持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以明治維新君主立憲為傾向的改革理念，然而近衛篤磨因康、梁放棄日本國力伸張至中國的觀點，加上他與南方總督張之洞、劉坤一等在後來互動關係密切，並寄予期待之現實因素考量下，終於與最初的理念相左，不再支持維新變法。足見東亞同文會的行動方針，其實隨著時勢的動向而有所更替。

另一方面，隨著 20 世紀初日本逐漸涉入遠東國際問題，東亞同文會的對外理念也時有轉變。接下來的兩章處理的便是以清末最後十年的兩件重大事件——庚子事變和日俄戰爭——為例，探討有關東亞同文會的態度以及日本當局所受的影響。第四章「義和團事變期間的『聯邦保全』構想」談的是事變期間日本加入八國聯軍陣營，東亞同文會的領導人之一根津一便提出了「聯邦保全」的因應策略，響應支持南方總督「東南互保」主張（頁 108-110）。不過，由於事變之後，俄國在滿洲地區的勢力日益擴張，近衛篤磨於是因應配合日本政府的外交策略，改變了「聯邦保全」的地方分權主張，轉為支持中央集權，開始回歸到「保全支那」的理念。第五章

「中國的輿論形成活動」部分，則以 1900 年在上海創刊的《同文滬報》的政論內容為例，討論東亞同文會對於「保全支那」的輿論宣傳。從《同文滬報》的政論可知，東亞同文會積極批判清廷對俄外交政策，指責俄國在滿洲地區的諸多行動。不惟如此，該報並提供解決中國改革之道：即模仿日本明治維新的經驗，甚至由日本提供合作的管道。

1911 年辛亥革命的發生，遂使中日兩國關係產生變化。本書第六章「辛亥革命及初期共和國家的認識」指出，原先東亞同文會希冀透過日本的影響而促使中國形成中央集權國家，結果轉向支持革命派。在民國建立的最初幾年間，東亞同文會非常注意列強在中國的動向，特別是支持袁世凱政權的英、美等國。民間團體的看法或許也印證了日本當局的策略：一方面反對袁氏恢復帝制的企圖，另一方面也積極地強調日本對於中國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的支配與控制。二十一條要求的提出，便是以日本政府「優先在華權益」作為基礎的中日同盟論（頁 205）。然而，東亞同文會會員犬養毅和柏原文太郎卻認為，日本此舉似乎形成了兩國關係的障礙，他們則提出「平和同盟」、「經濟同盟」與「精神同盟」三方案，以促進兩國的外交關係（頁 208-9）。

第八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日中共存論」和第九章「滿州（滿洲）事變期間的時局觀」，則就二、三〇年代的中國情勢來分析中日問題。作者推論，有幾項因素改變了兩國從友好到敵對的外交關係：其一，由於中國民族主義的高漲，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巴黎和會召開，因為「山東問題」而促成的五四運動，讓中日兩國關係蒙上一層陰影；其二，隨著收復利權政策的展開，中國境內高唱廢除治外法權等各種不平等條約，都獲得了英、美國家的支持，與日本當局意圖強化在華的利益衝突，促使排日風潮日盛；其三，滿洲事變發生後，為了正當化日軍的軍事活動，強調「亞洲人的亞洲」主張，組織「亞洲聯盟」的構想，成為日本意圖脫離在國際孤立情況的原則。東亞同文會的立場也反映出日本當局的基調，由「保全支那」理念轉換為近衛篤磨最初所謂的「東洋門羅主義」。也就是說，東亞同文會認為日本當局和列強的中國政策應有所不同，鼓勵亞洲民族聯合對抗歐美列強；至於實際的行動方面，也和民國初立期間因俄國策動滿蒙獨立而持反對態度有所不同，反倒積極地「擁護」滿蒙權益，甚至主張滿洲國的成立。

大體而言，本書在資料的蒐集方面，鉅細靡遺。作者非特掌握了東亞

同文會重要成員已經出版的日記、書信，並且還爬梳了該會相關的機關出版刊物、報紙與書籍，像是《支那》、《同文滬報》、《東亞同文會報告》等，甚至包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檔案；也充分地注意到中日其他相關方面的資料。顯然，作者克服了資料蒐集與語言障礙的問題。

可惜的是，作者似乎忽略了西方研究的努力，使得對現有的基礎成果並沒有進一步發揮。第五章裡關於《同文滬報》政論的分析，便是一例。其實本書正提供了 Douglas R. Reynolds 教授研究清季中日關係時所謂「黃金十年」(golden decade)的一項佐證。根據 Reynolds 教授的說法，中國的傳統帝制政治雖歷經辛亥革命而推翻，然而實際上清朝最後十年的新政推行，為此後提供了持續改革的基礎，故他稱之為「新政革命」。⁷這當中最耐人尋味的便是中國全面地學習與改良日本政經制度，可以說，整套思想資源和概念工具是建立在日本人的協助之上。這項說法儘管受到了強烈的質疑，⁸本書作者卻從非官方團體的刊物討論裡，分析庚子事變後遠東國際的政治外交關係，對於日本對華的積極態度，給予我們類似的解釋。

另一例是關於袁世凱稱帝的問題，據過去的討論指出，日本的反對後來形成極為關鍵的因素。⁹作者即以東亞同文會的看法來進行討論，進而在政府政策和非官方團體的外交認識之間，釐清其中的相互關係。

從篇幅結構來說，全書的方法係以運用年代和事件為軸，藉此窺視東亞同文會在每段時期所呈現的不同主張。據此，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作者如何描繪同文會在日本對華政策的影響，尤其以辛亥革命做為分界，中日關係特別是日本民間方面對華態度的轉變。簡單地說，民國的成立以及初期政局的混亂，作者給我們的印象是日人態度是由合作轉為控制，行動則明顯趨於侵略。這樣的看法，其實也與作者在第一章意欲分析研究的「亞洲主義」的進展相互呼應（頁 19）。同時，本書還涉及到輿論與政府政策、輿論如何形成和傳播等問題，這些複雜的討論，書中各章也都分別顧及，可以說是最為精彩的部分。尤其第四章關於「聯邦保全」構想的討

⁷

Douglas R. Reynolds, *China, 1898-1912: the Xinhai Revolution and Jap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中譯本參閱任達著，雷頤譯，《新政革命與日本：中國，1898-1912 年》（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尤其是第一章的說明。

⁸

對 Reynolds 一書的評論，可參照 *Journals of Asian Studies*, Vol. 53 (1994), pp.174-75.

⁹

Kwanha Yim, "Yuan Shih-k'ai and the Japanese." *Journals of Asian Studies*, Vol. 24 (1964), pp.63-73.

論，不惟過去缺乏討論，亦是全書主要貢獻之一。

然而，本書所呈現的課題，尚可再行深化與討論。首先，作者過於偏重東京的東亞同文會本部及上海地區相關的組織，沒有顧及其他相關支部的討論。例如，漢口發行的《漢報》，福州的東文學堂和《閩報》，廣州的東文學堂與時敏學堂，甚至南京、天津、漢口同文書院等，均未深入探討。推究其因，可能因為資料分散所致。但此一問題涉及有二：其一為各地域與東亞同文會之間的關係，特別是各地區內中國教師與學生如何與東亞同文會的互動；其二為地方性同文書院與親日報紙的創辦，究竟怎樣來影響東亞同文會的態度，乃至日本對華的外交政策，故仍值進一步追索。¹⁰

其次，有關第七章「在中國的調查活動」討論的是東亞同文會在華的教育事業，亦即東亞同文書院的實地調查活動。筆者認為，作者僅分析目的與功能，不惟不足，而且和全書探討的方向迥異，顯得略有突兀之處。究實而論，這方面的研究甚夥，必須指出的是：東亞同文書院大規模的調查活動固然受到普遍重視，卻無法忽視日人長期以來透過旅行遊記對於中國的瞭解，¹¹兩者之間其實有著深切的關係。作者的分析，只著眼在東亞同文會所進行的調查活動上，並沒有投射到過去的歷史淵源，不能說是沒有遺憾。再者，其中雖已涉及了外交、經濟與文化面向的討論，卻忽略了中國和其他外國人的輿論。在這一方面，薄井由已經有相關研究，¹²可供參考。

整體而言，翟新先生的這部《東亞同文會與中國》，嘗試解答中日兩國政治、外交的方向和努力，是足以令我們讚賞的；而全書遺留下來的問題，不但可供吾人深省，也是值得進一步繼續探索之處。

¹⁰ 細野浩二對此已進行了初步相關的討論，見氏著，〈東亞同文會の對外認識と文化工作の構圖：歐米列強と清末民初中國のはざまで〉，收入阿部洋編，《日中關係と文化摩擦》（東京：巖南堂書店，1984），頁101-58。

¹¹ Joshua A. Fogel, *The Literature of Travel in the Japanese Rediscovery of China, 1862-1945*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1996).

¹² 薄井由，〈東亞同文書院大旅行研究〉（上海：上海書院，2001），頁232-4。